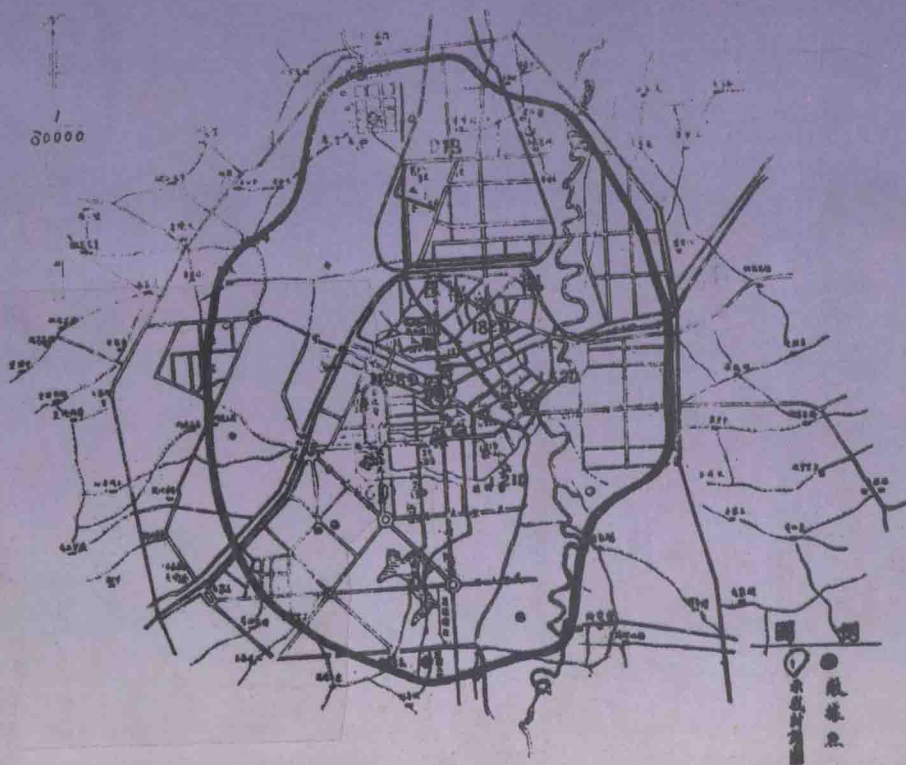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长春围困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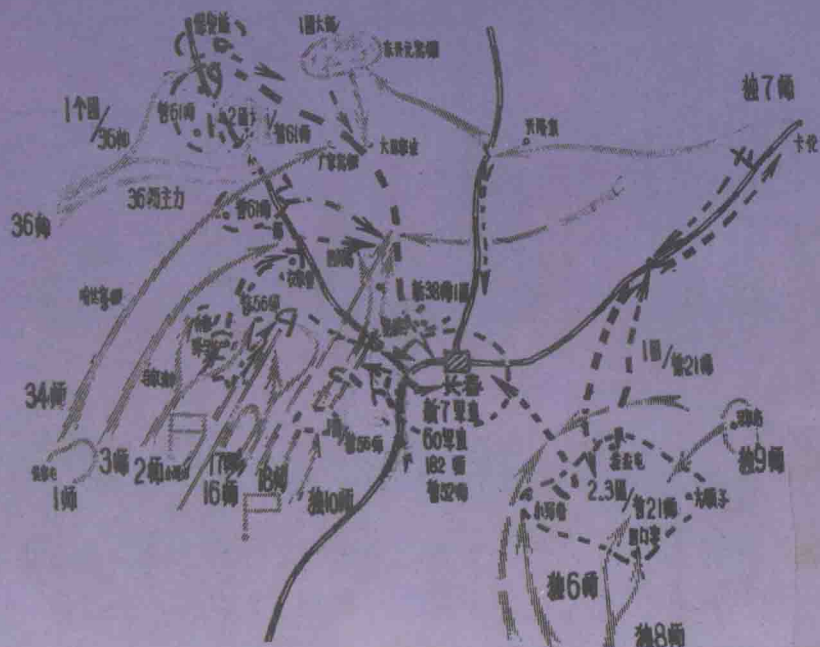
主编 张赞新 孙淑范 副主编 高英杰

长春敌军分佈及救軍圍困圖 1948.8.20.



长春外围战斗略图

(1948年5月24日)



长春围困战综述

高英杰

一、长春与东北战场

1948年，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我人民解放军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解放区扩大了，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人民群众支援战争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与此相反，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经济上濒临破产，军队士气低落，作战能力下降，被迫进行“重点防御”。长江以北的兵力龟缩在以西安、武汉、徐州、北平和沈阳为中心的五个战区内。

在东北战场上，我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70万，地方部队30万。解放区的面积已占整个东北的97%，人口占86%，而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兵力则下降到48万，地方军7万。东北战场成为全国五大战场中我正规军数量超过蒋军的惟一战场。东北敌军依据蒋介石“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确定了“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指导方针（北宁线是指北平至沈阳的铁路线），并作了如下的兵力部署：以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率第八、九两个兵团约30万人，防守沈阳地区；以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两个军约10万人，防守长春；另一个“剿匪”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第六兵团等四个军约15万人，防守锦

州、锦西地区。

根据全国战略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认为，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决定把决战的首战选择在东北战场，这就是著名的辽沈战役。长春围困战是辽沈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从3月中旬开始，我军对长春展开了由远距离合围，到近距离包围封锁，继而由5月下旬至6月初的强攻战势转变成“长困久围”的战略方式。在我军事围困、经济封锁和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在我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这一重大因素的影响下，长春守敌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郑洞国被迫投降，使长春这座大城市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

长春地处东北平原腹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整个东北。1932年3月1日在日本的扶植下成立了伪满洲国，定都长春，改长春为新京。从此长春成为日本统治东北的政治中心，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就设在长春。日本为掠夺我东北的资源以及反对苏联的战略需要，在东北广修铁路。于是，长春不仅有中东铁路（沈哈线）纵贯南北，又有长白线、长图线横穿西东，成为东北腹地的铁路交通枢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8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周保中部配合苏联红军进驻长春。从此，苏军对长春开始实行军事管制。按中苏条约规定，苏军于1946年4月14日撤离长春，长春落入国民党接收大员之手。但同日，我东北民主联军外围部队以3路大军展开了与国民党军队争夺长春的首次争夺战。战至4月18日，我军攻克了长春，全歼守敌2万余人。长春市委、市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政权建设等工作。但由于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大肆推进，我军在四平保

卫战给其沉重痛击后开始主动北移，于是长春又于1946年5月23日落入国民党之手。从此，先后在长春驻防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分别有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和后来的新七军及六十军。

在东北战场上，长春由于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它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重要区域。首先，从国民党方面来看，自1946年5月我军主力部队进行了战略北移后，长春主要由国民党新一军占据，其所辖新三十师、新三十八师和第五十师驻扎在以长春为中心及以北的重要战略据点之中。此间，长春成为敌军窥视和进犯我北满解放区的中心或前哨指挥所。1946年末敌军大肆进犯和骚扰我松花江沿岸地带是以长春为中心的，1947年初春我北满主力部队3次南下松花江作战，敌军也是以长春为中心调动主力部队北援的。因此，长春成为敌军防范我北满主力部队反击和准备大举进犯我北满根据地的大本营。其次，从我军方面来看，长春及其周围的一些战略据点一方面是敌军北犯的前哨，另一方面又将是我军战略大反攻的极大障碍。因此，拔掉和扫清这些威胁我军前进道路上的桥头堡或拦路虎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于是，我军在1947年初展开了大规模的出击作战，我北满10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在3个半月时间里曾3渡南下松花江作战，先后拔掉了其塔木、城子街、靠山屯、农安县城等重要战略据点，给敌新一军的新三十八师、新三十师、第五十师以沉重打击（各被我军歼灭一个团），同时还歼灭了敌增援部队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一个整师，重创了敌八十七师，打消了敌军的嚣张气焰。接着，我军又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迫使敌军在吉林省境内仅存有吉林、长春、四平3个据点，我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1月1日始称）取得了战略的主动权。

此时的长春，敌新一军由于受到我军的重创而换防，由新

组建的新七军驻守。我军从1947年12月中旬到1948年3月中旬发动了冬季攻势，敌军占据的吉林、四平两要地也先后落入我军之手，这样长春就成了一座孤城。从吉林撤至长春的敌六十军与敌新七军构成据守孤城的“困兽”。

从整个东北的战略流程上看，我们将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比喻成一只虎，那么在我军展开战略大反攻前它还是一只穷凶极恶的猛虎，长春就是这只猛虎的头，它张着血盆大口觊觎着我北满解放区，它的后尾横扫了南满的大部分地区，但只因为它的四肢受到我东满、西南、南满等有生力量的牵制与束缚而疲于奔命，因此它伸向长春的这颗头也只能是时常的吼叫几声而已。在我军发起战略大反攻后，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却变成了一只饥饿疲惫的困兽。这只饿虎掉转了方位，原是张着血盆大口的虎头（长春）转为拉长了的尾巴，沈阳构成了这只饿虎的腑脏，它的头转向了辽南，而锦州又处于它的咽喉部位。此时，摆在东北人民解放军面前的有两种抉择，是先斩断其虎尾，还是狠击其虎头，卡住它的咽喉。从当时的态势上看，如若我军用大力气斩断这只虎尾（长春）就将造成这只秃尾巴的饿虎窜入关内，构成对我华北解放军的威胁；如若我军将这只虎的尾巴牢牢地捆扎起来，使其形成欲缩不能，欲回头又恐遭痛击的局面，最后被活活拖死在东北。经过几番争执和尝试，最后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中央军委达成一致共识，采取后一种战略方案，拖住东北国民党军，关起门来打狗，将其就地歼灭。

二、长春围困战的三个阶段划分

作为辽沈战役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长春围困战，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初围长春阶段，即以主力部队远距离包围长

春，时间是1948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敌六十军于3月9日撤往长春，3月13日我军攻占了四平，这样我东满和松江等部向长春靠拢，其中有6个独立师分别进至长春东南和长春以北地区，开始对长春实施远距离封锁，而我军6个主力纵队在四平周围修整并密切注视着长春之敌的动向。在此期间，我军独五师（后改编为第十二纵队之三十六师）和独十师先期接近了大房身飞机场，并对机场实行火力控制，对敌军的空中通道构成极大的威胁。

第二阶段：为长春外围战，时间从1948年5月下旬至6月初。我军以第一纵队（3个师）、第六纵队（3个师）、第十二纵队的两个师和5个独立师（独六、七、八、九、十师）共13个师的兵力对长春外围据点发起进攻。此阶段我军的主要意图是攻取长春，并相机打击由沈阳方面出援之敌，以获取“攻点打援”之双丰收。由于我军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各部队配合不够协调，兵力与火力不够集中，且又缺乏攻城经验，没有攻下长春，然而，我军发起的长春外围战仍歼敌4个团，5000余人，攻取了大房身机场，切断了敌军的空中运输线，这就为以后的“久困长围”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对长春实施“久困长围”，时间从1948年6月初至10月中下旬。在4个多月时间里，我围城部队以10个师的兵力对长春守敌实行了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的“久困长围”方针，最后迫使敌六十军阵前起义，新七军投诚，使长春得以和平解放。

三、长春围困战期间敌我双方参战部队及主要将领

1948年3月15日，郑洞国来长就任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第一兵团司令部其他要员有曾泽生任第一兵团副

司令兼六十军军长，杨友梅任兵团副参谋长。当时郑洞国统辖两个正规军和一些地方杂牌军，共计 10 万余人据守长春。

新七军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这个军是 1947 年冬以新一军之新三十八师为基础扩编而成的，全军共计 3.4 万余人。下辖新三十八师、暂五十六师、暂六十一师、预备师和青年教导团。

新编第三十八师，原为新一军之三十八师，该师的 3 个团虽都曾遭到我军的重创，但很快得以补充。该师兵员和装备属长春守敌中第一流。全师 1.2 万人，师长史说，后改为陈明仁，副师长为彭克立，下辖一一二团、一一三团、一一四团。

暂五十六师，由原伪满铁石部队改编而成，师长刘德溥（后改为张炳言），参谋长刘大名，全师 7000 余人。

暂六十一师，是在 1947 年冬以保安第三支队（原为保安第十二支队）及嫩江保安队改编而成，其成分大部分为土匪、伪军及铁路警察，师长邓士富，副师长宁伟，参谋长曾德辉，全师 7000 余人。

此外，新七军还下辖一个预备师（即补充师）7000 余人和一个青年教导团 2500 余人。

国民党第六十军是一支来自云南的地方部队。军长曾泽生，参谋长徐树民，副参谋长冷克。下辖第一八二师、暂编第二十一师、暂编第五十二师、预备师及军直属队，全军共计 3.6 万人。

第一八二师，兵力约 1 万人，为六十军主力。师长白肇学，副师长为李佐，参谋长杨正隆。

暂编第二十一师，兵力约 9000 人。师长陇耀，副师长任孝宗，参谋长杨肇骧。

暂编第五十二师，兵力为 6000 余人，由地方铁路警察改编

而成。师长李嵩，副师长欧阳午，参谋长汤启全。

预备师，由吉林师管区志愿兵第四、五、六等3个团组成。共约7000人，后期也补充到各师。

第六十军军直属队，尚有输送团、山炮营、工兵营、通信营、特务营、汽车连等，共约4000余人。

长春守敌除新七军和六十军这两个正规军外，还有一些地方杂牌部队。

吉林保安司令部，司令梁华盛，后由郑洞国兼任，副司令李寓春。下辖两个保安旅和一个独立团，兵力8000余人。保安一旅下辖3个团，旅长何大刚；保安二旅刚刚组建，旅长何恃气；独立团团团长张贯三，该团为土匪武装。

骑兵第一旅，成份复杂，由各路土匪武装合编而成，共约3000余人，旅长为韩云五。

骑兵第二旅，下辖两个团，约2000余人，旅长由杨友梅兼任。

“吉黑人民剿匪总队”，以军统局特务头子袁晓轩为首，人员有4000余人。

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共有6个新兵大队，共约1000余人。

长春警备司令部，李鸿兼司令。下辖宪兵营、吉林警察总队、长春市警察总队、“长春市人民自卫总队”，共计3400余人。

新一军留守处，主任范纯士，所属老弱病残人员3000人。

上述各部构成长春守军的全部人马。

东北人民解放军参加围困长春战役部队及主要将领如下：

第一前线指挥所，1948年4月组建，以辽东军区机关为基础，联合东前指、松前指共同组建，6月改为“围指”，9月改为第一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陈光、陈伯钧任

副司令员，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方）沛然任参谋长，潘朔端任副参谋长。

先后参加围城作战的部队有：

第一纵队，参加了长春外围战斗。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副司令员曹里怀，参谋长杨尚儒，政治部主任刘贤权。下辖3个师。第一师师长江拥辉，政委黄玉昆；第二师师长贺东生，政委王树君；第三师师长刘贤权，政委方国安。

第六纵队，参加了长春外围战斗，其中所辖的十八师参加了长春围困战的全过程。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李作鹏、杨国夫，参谋长黄炜华，副参谋长黄一平，政治部主任邓飞（后改为张池明）。下辖3个师，十六师师长李作鹏（兼），政委张池明；十七师师长龙书金，政委徐斌州；十八师师长阎捷三，政委袁克服，副师长黄荣海，副政委孙汉，参谋长周明国，政治部主任朱子统。

第十二纵队，该纵队于1948年3月由原“东总”直属独二师、独四师和独五师合编而成。该纵队参加了长春围困战的全过程。司令员钟伟，政委袁升平，副司令员熊伯涛，副参谋长王亢，政治部主任陈志芳。下辖三十四师（原独二师）、三十五师（原独四师）、三十六师（原独五师），全纵2.7万余人。其三十四师师长温玉成，政委谭友林，副师长兼参谋长王亢；第三十五师师长王奎先，政委栗再三，副师长李光汉，参谋长姚克；第三十六师师长沈启贤，政委王建中，副师长郑贵清，参谋长方谦。

独六师，由吉林军区二线兵团的三个独立团及吉南军分区第七十一团编成，以吉敦军分区机构为师直单位。师长邓克明，政委钟人仿，副师长全榆、马逸飞，副政委祝世风，参谋长刘苏，政治部主任江学彬。

独七师，由松江军区二线兵团之独一、独二、独三团及军区警卫团编成，以松江军区直属机关抽调一部分干部为师直单位，师长罗华生，政委邱子明，副师长程启文、余勋光，参谋长刘可天，政治部主任童浩生。

独八师，由牡丹江军区二线兵团之三个独立团及合江军区二线兵团一个独立团编成，以牡丹江军区直属机关抽调一部人员组成师直单位。师长刘子奇（后任王明贵），政委邹衍，副师长蔡久，参谋长章申，政治部主任桂生芳。

独九师，由龙江军区二线兵团之一、二、三团与嫩江军区二线兵团之三团编成，以龙江和嫩江两个军区各抽出一部分人员组成师直单位。师长廖仲符，政委钟民，副师长罗文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文邦，参谋长冉泽，副参谋长郑扶。

独十师，由辽吉军区第一军分区独立第十三团，第二军分区独立第十六团、第十八团编成，以第二军分区直属机构为师直机构。师长赵东寰，政委蔡明（后任崔国辉），副师长邓中仁，参谋长王玉华，政治部主任江腾蛟。

独十一师，由吉南军分区第七十二团、松江军区第八团、牡丹江军区独立第三团编成，以吉南军分区机构为师直单位。师长王效明，政委宋景华，副师长李德山，参谋长康干生，政治部主任王海清。

以上各部是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先后参与长春围困作战的主体。参与后期围困战的部队主要是由第一兵团所辖的第十二纵队、第六纵队之十八师和独六、七、八、九、十、十一师，计10万余人。

四、“久困长围”的特殊战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的三年解放战争中，长春

是我军收复的第一座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大城市。解放与收复长春的战役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战例。在解放战争史上，长春围困战是持续时间最长、战势最为复杂、我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战果的战例。

（一）强大的军事包围使长春守敌突围无望

1948年3月，吉林、四平相继为我军攻取，东北国民党军队仅龟缩在沈阳、锦州、长春三大孤立据点及其若干地区。在是否放弃长春这一问题上，国民党要员们存在着意见分歧。首先提出放弃长春的是当时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郑洞国，他在赴吉林、长春视察并亲自部署、指挥六十军撤至长春回到沈阳后，就向蒋介石和卫立煌建议“鉴于长春守军距离主力太远，随时有被解放军吃掉的危险，应主动放弃长春，将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这样能战、能守、能退，能支撑一下岌岌可危的战局”。就当时的战势看，长春守敌向沈阳突围还是有可能的。但蒋介石没有同意郑洞国的建议，他认为放弃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长春尚能吸引一部分解放军主力，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于是卫立煌和蒋介石先后下令派郑洞国前往长春，任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担负起“困守长春的重任。”

郑洞国来到长春之时，我军先头部队已接近长春，并对大房身机场实行了火力控制，我主力部队正在长春周围地区集结整训，随时监视着长春之敌的动向。5月下旬，郑洞国指挥长春守军出城展开出击行动，企图抢夺长春周围的一些战略据点，以确保大房身飞机场的安全，但这一企图很快失败，我军乘势以13个师的兵力与敌展开了长春外围作战，结果击退了敌军，夺取了大房身机场，彻底切断了敌军的空中运输线。长春被我军包围得水泄不通。此后，长春守军的给养只好靠空投来补充。

1948年9月中旬，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北宁线作战。此间，我军对围城部队做了调整，但我第一兵团所属的围长部队仍有10个师10余万人。锦州战势惊动了长春守敌，10月初郑洞国指挥长春守军从西面突围，但很快被我军击退，敌军只好退回城内。然而，就在长春之敌突围不成之时，蒋介石却在10月中旬三番五次下令，命令郑洞国立即率队突围，并训斥称“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司令军长等退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而“总统下令容易，真正突围谈何容易？现在城外共军兵力雄厚，而我军是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的”（曾泽生语）。针对蒋介石的突围指令，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说得更具体“就是突围出去了，这七八百里地，中间没有一个国军，官兵又都腿脚浮肿，不要说打仗，就是光走路都成问题呀！”面对我军兵临城下，重重围困，突围无望的现实，长春守敌只有两种选择，或是武装倒戈，光荣起义；或是坐以待毙，缴械投降。

（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长春守敌山穷水尽

军事包围开始之日，就是经济封锁之时。经济封锁是当时我军对敌作战的一种重要的策略原则。5月25日我军攻战大房身机场，长春守敌陷入重围。敌军出城抢粮已成为不可能，经济封锁也正式开始。6月下旬，我“围指”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东北局指示，并布置了对长实施经济封锁的具体措施，第一，粮食、蔬菜、柴草、牛马牲畜等一切生活资料，均不得进入长春市；第二，断绝长春市与我区人员来往及一切商业关系；第三，肃清我边缘区及敌我双方中间地带的一切土匪及一切走私人员。我围城部队将长春周围25公里内划为封锁地带，参加封锁任务的以围城部队为主，地方武装为辅。

经济封锁分为空中和陆地两个方面。空中封锁，主要由围

城高射炮部队担任。自从大房身机场被我军攻占后，空投就成为长春守敌的生命线。根据这种情况，我围城部队先后调来4个高射炮团，用高射炮打击敌人的空投。这样，空投敌机就不敢低飞，只好在高空投掷，其目标的准确率就大大下降，有些物资落到我军阵地，有的落到两军阵地的中间地带（晚间被我方抢运过来），有的落入城内（但不是指定地点）而被居民抢散。总之，敌空运的粮食或其它用品平均要损失三分之二左右。

经过长期的经济封锁，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第一，经济封锁政策的实施严重地削弱了长春守敌的士气和战斗力。大多数守城士兵常以糠草代粮，以稀代干，普遍流行着泻肚、盗汗、眩晕、浮肿等病症。使之军心动摇，丧失了战斗力。第二，实行经济封锁，进一步加剧了蒋军内部固有矛盾的激化。长春守军中，新七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粮食储备和供应上优先，而六十军为地方部队，是后撤至长春的，事前粮食准备就不充分，缺粮现象更加严重，因此六十军士兵和其它地方杂牌部队经常有抢夺空投粮食的现象，械斗事件也时有发生。城内蒋军的嫡系与非嫡系军队之间的矛盾加剧。第三，经济封锁后，长春市内社会秩序一片混乱。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杀民养军”和横征暴敛政策，使得城内工厂倒闭，店铺关门，民不聊生，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使长春成了人间地狱。

（三）威力强大的政治攻势，严重地瓦解了敌军阵营

瓦解敌军，是毛泽东同志为我军政治工作规定的重要原则。我军历史的克敌制胜，不仅依靠指战员的英勇善战，而且也依靠对敌军的政治瓦解。我各围城部队自靠近长春后，就对敌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6月28日，根据围城总方针，围城指挥所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肖华政委在会上指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会议分析了长

春守敌的特点：①部队复杂，有嫡系部队、云南滇系部队和土匪杂牌部队等，彼此间互相矛盾，相互排斥；②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孤立无援，士气日益低落；③由于我方的宣传工作，敌人对我军的政策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④东北籍新兵多，归乡心切，盼望早日结束战争。会议提出，我军必须利用这些矛盾，强化政治攻势，达到削弱敌人斗志，瓦解敌人战斗力，最后夺取长春的目的。

我方对敌政治攻势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阵前喊话。开始时，指战员们是用嘴喊，宣传我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后来，战士们发明了筒式的话筒喊话，有的部队还配备了高声喇叭，建立了广播站，昼夜不停地喊话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城围攻势的后期，我方还利用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士兵和敌军家属阵前喊话，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我方的感受劝说敌军，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2. 散发宣传品。在这方面，我围城部队因地制宜地创造了许多好的形式。利用迫击炮打宣传弹，用这种办法送的远，散的宽，城内兵民都可拾到，使敌人防不胜防；用木箱做成“宣传船”，通过伊通河飘进城内；有的还利用放风筝的形式，将宣传品散发到城内；还有的通过送礼品、请客吃饭等方式将宣传品带入城内。围城期间，仅就传单一项我方就翻印和散发了30余种，3万余份，严重地瓦解了敌军的斗志。

3. 派遣地工人员深入敌军内部，瓦解与分化敌军营垒。首先，我方派刘浩同志前往六十军，与六十军中上层军官联系做他们的工作，并接通了与六十军中我地下党组织的关系，以便于我方随时掌握六十军的情况；其次，我方还将被教育好的被俘军官（如张秉昌、李峥先等人）有计划地放回城内，做敌六十军的工作；第三，我方还将在我解放区的敌军官家属送往城

内，通过他们宣传我军的政策，感化城内敌军官兵。

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长春守敌越来越恐慌，军心日益涣散。在绝望之际，很多官兵在寻找出路，因此向我们投诚的人员与日俱增。自6月25日到10月6日，我军共收容投诚敌官兵1.8万余人，在投诚者中，有的是独自来的，有的是三五成群结伴而来的，有的是整班、整排集体而来的。其成员有士兵，也有中下级军官，同时这些投诚人员还携带来大批的六〇炮、轻重机枪、冲锋枪、马步枪等武器弹药。

五、和平解放长春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部署，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9月12日起发动了大规模的北宁线作战，即后来所谓的“辽沈战役”。我军以6个纵队（6个军）的兵力对锦州发起了强攻，与东北之敌展开了大决战。我军此举震惊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10月6日长春守敌在郑洞国的指挥下企图组织一下试探性的突围，结果以损失了一个团兵力的代价无功而返，从此长春守敌也不敢轻举妄动。

10月10日，蒋介石急令郑洞国率部突围，但此时的长春守敌士气低落，丝毫没有战斗力了。在面临突围无望、欲战不能的情况下，曾泽生统领的六十军毅然走上了反蒋起义之路。9月22日，曾泽生就将陇耀（暂二十一师师长）、白肇学（一八二师师长）请到他的办公室商谈反蒋起义之事，接着3人又多次密商大计，并于10月14日派出张秉昌、李峥先两人出城与解放军联络，16日晚两人返回六十军军部，向曾泽生报告了围城解放军领导的态度和意见，随后曾又派出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和暂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作为起义正式代表，连夜出城与我方商定有关起义具体方案。10月17日，国民党六十军在曾泽生率

领下宣布起义。

是日午夜 12 时，我独八师、独九师按计划进城，与六十军进行防务交接。至 18 日晨，长春城内东部地区已在我军控制之下。在大势所趋面前，敌新七军也派出代表与我方洽谈投降之事，双方达成协议，于是 19 日上午 10 时，按预定方案，新七军放下了武器，我军接收了长春市的南半部。此时，长春市内基本上在我军控制之下，只剩下郑洞国与其卫队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但至 21 时晨 4 时，中央银行内的敌军向空中象征性地放了一阵枪后便打着白旗出降了。

就这样，被困了数月之久的长春回到了人民的手中。